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

(中)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熊礼江

闵泽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熊礼汇

闵泽平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

唐

五代

卷

(中)

盧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中、下)/陈文新主编;刘加夫(上)、熊礼汇 闵泽平(中)、霍有明(下)分册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5438-4531-8

I.中... II.①陈...②刘... III.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隋唐时期②文学史—编年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IV.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7657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中、下)

责任编辑: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杨 纯 邓胜文 张志红 聂双武

特约编辑:熊治祁

主 编:陈文新

书名题字:卢中南

装帧设计:陈 新

出 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市场营销:0731-2226732

网 址:<http://www.hnppp.com>

邮 编:410005

制 作: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4 1/16

印 张:108

字 数:2,374,000

书 号:ISBN 7-5438-4531-8/I·448

定 价:804.00元(上、中、下册)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编 陈文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闵泽平 熊礼汇

☆国家985建设项目



总序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

1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证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入，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年7月23日于武汉大学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 论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四部丛刊本，下同。本书所用版本，均只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卷一《与王驾评诗》：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沅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无可、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徧浅耳。

姚铉《唐文粹》（四部丛刊本）序：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轹，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焉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词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今世传唐代之类集者，诗则有《唐诗类选》、《英灵》、《间气》、《极玄》、《又玄》等集，赋则有《甲赋》、《赋选》、《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尔。

穆修《河南穆公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唐柳先生文集后序》：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率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

范仲淹《范文正集》（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下同）卷六《尹师鲁河南集序》：予观《尧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醪迭变，代无穷乎？惟抑末扬本，去郑复雅，左右圣人之道者难之。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

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卷二〇一《文艺上》）：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濡吟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轹汉、周，唐之文，



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石介《徂徕集》（四库本）卷一二《上赵先生书》：唐之初，承陈、隋剥乱之后，余人薄俗，尚染齐、梁流风，文体卑弱，气质丛脞，犹未足以鼓舞万物，声明六合。……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众人耳惯，所听唯郑卫憇憇之声，忽然闻其太古之上无为之世雅颂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丧聪，如失明，有骇而亟走者，有陋而窃笑者，有怒而大骂者。丛聚嘲噪，万口应答，声无穷休。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数十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如日月、浑浑灏灏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

晁说之《嵩山文集》（四部丛刊本）《景迂生集》卷一八《题黄龙山僧送善澄上人诗卷》：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释门诸公，挹山川之英，而绝尘垢之外，其邈然粹然者，岂非学士大夫为之助欤？汤休之诗，实自于鲍明远；灵一律师之诗，既学潘、阮、江、谢，而又得李华、朱放、张继、皇甫冉、张南史以游焉；皎然禅师，实谢灵运之裔孙，其相从则颜鲁公、韦苏州、孟襄阳、李袁州、陆长源、皇甫曾、陆羽、张志和；广宣则韩吏部、柳柳州、刘、白。

《朱子语类》（黎靖德、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卷一三九：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

王正德《余师录》（四库本）卷三引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尝论唐人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湜，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近。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濩。翱、湜优柔泛滥，而词不掩理。杜牧清深劲峻，而体乏步骤。梦得俊逸丽缛，而时窘边幅。子厚雄浑飘肆，有悬崖峭壑之势，不幸不发于仁义，而发于躁诞。至退之而后淳粹温润，駸駸乎为六经之苗裔。又引《谒顾子敦侍郎书》云：唐兴，三光五岳之气不分，文风复起。韩愈得其温淳深润以为贯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飘逸果决者，仅足窥马迁之藩键，而类发于躁诞。下至孙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边幅。李翱、刘禹锡，刮垢见奇，清劲可爱，而体乏雄浑。皇甫湜、白居易，闲澹简质，斫去雕篆，而拙迹每见。回宫转角之音，随时间作，类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听。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一〇一《柯岂文诗》：观人言语，可以验其通塞。郊、岛诗极天下之工，亦极天下之穷。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经年始足下句者；有断数须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种文字，其人虽欲不穷，不可得也。元、白变其体，求以谐俗，茗坊酒垆往往传诵，诗稍滥觞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从，余所谓通塞之验非耶？

赵孟坚《彝斋文编》（四库本）卷三《凌愚谷集序》：文章至唐而体备，其情态婉



委，肌理丰泽，腴而密，婉而丽，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贞元、元和而上，李、杜、韩、柳以至乎长庆元、白，皆唐文之懿也。

《历代名贤确论》（四库本）卷九八孙何云：魏晋已降，文体卑贱，固不足论。若乃羽姬翼孔、卓尔大得、根仁抵义、动为世法者，独唐贤为最。所著论议，杰然尤异者，若牛相僧孺《从道善恶无余》、皇甫湜《纪传编年》、《夷惠清和》、独孤常州及《吴季札》、权文公德《两汉辨士》等论、高仆射郢《鲁用天子礼乐》、韩吏部愈《范蠡与大夫种书》、吕衡州温《功臣怨死》、白官傅居易《晋恭世子》等议，或意出千古，或理镇群疑，或重定褒贬之误，或再正名教之失，无之足以惑后人，有之足以张吾道。

沈作喆《寓简》（四库本）卷五：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昔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曰：唐有天下，科试愈盛。自武德、贞观之后，至贞元、元和已还，名儒巨贤，比比而出。有宗经立言如丘明、马迁者，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有驰骋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轹颜、谢，诋诃徐、庾者，如陆宣公、裴晋公皆负王佐之器，而尤以举子事业，飞腾声称。韩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克意雕琢，曲尽其妙。持文衡者，岂不知诗赋不如策问之近古也。……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

《瀛奎律髓汇评》（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四方回评《百花亭》诗云：大抵中唐以后，人多善言风土，如西北风沙酪浆毡幄之区，东南水国蛮岛夷洞之外，亦无不曲尽其妙。

郝经《陵川集》（四库本）卷二三《答友人论文法书》：至李唐，则韩、柳氏为规矩大匠。如韩之《答李翊》、《上于襄阳》、《答尉迟生》、《与冯宿》，柳之《与杨京兆》、《答韦中立》、《报陈秀才》、《答韦珩》、《复杜温夫》及与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翱之《答王载言》、《寄从弟正辞》，皇甫湜之《答李生》、《复答李生》，下逮欧、王、苏、黄之论议，则穷原极委，无所不至其极，无法复可说，百世有余师矣。

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引时天彝云：自储光羲而下，王建、崔颢、陶翰、崔国辅皆开元、天宝间人，词旨淳雅，盖一时风气所钟如此。元和以后，虽波涛阔远，动成奇伟，而求其如此等邃远清妙，不可得也。大历后，李纾、包佶有盛名，叔伦、士元从容其间，诗思逸发，于绮丽外仍有思致，非余子所及也。钱起屡擅场，《江行》百篇，韵短意密。卢纶与李益中表，唱酬交赞，在大历十才子中号为翘楚。司空文明结思尤精，如“前途欢不集，往事恨空来”，令人三叹不已。皇甫冉、鲍防、二张诗，在唐中叶，所谓铁中铮铮者。冉及张登、耿纬有全集，李端于《武陵集》，钱塘陈氏刊行，才各百余首，仅是断稿耳。文章尚论其世，长孙佐辅贞元前人，要为有一种风气。五言诗存者惟《联珠集》。叔向诗弥佳，传弥少，草木飘风之叹，不其然乎？羊士谔刺王、韦远贬，亦有气节。《十贤集》，士谔亦在其中。杨巨源始与元、白学诗，而诗绝不类元、白。王建自云绍张文昌，而诗绝不类文昌。岂相马者固不在色别乎？巨源清新明严，有元、白所不能至者。建乐府固仿文昌，然文昌恣态横生，化俗为雅，建则从俗而已，驯致其弊，便类聂夷中。



祝尧《古赋辩体》(四库本)卷七:且古赋所以可贵者,诚以本心之情,有为而发,六义之体,随寓而形,如云之行空,风之行水,百态横生,为变不测,纵横颠倒,不主故常,委蛇曲折,略无留碍。有不齐之齐,焉用俳?有不调之调,焉有律?及为俳体者则不然。骈花俪叶,含宫泛商,如无盐辈膏沐为容,而又与西施斗美。然天下之正色,终自有在。子美诗云:“词赋工无益。”其意殆为俳律者发。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赋,差强人意,但俳之蔓虽除,律之根故在,虽下笔有光焰,时作奇语,只是六朝赋尔。惟韩、柳诸古赋,一以骚为宗,而超出俳律之外。韩子之学,自言其正葩之《诗》,而下逮于《骚》;柳之学,自言其本之《诗》,以求其恒,参之《骚》,以致其幽。要皆是学古者。唐赋之古,莫古于此。至杜牧之《阿房宫赋》,古今脍炙,但大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矣。毋亦恶俳律之过,而特尚理以矫其失。

陈旅《安雅堂集》卷五(四库本)《宋景濂文集序》:大哉文乎,不可无渊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为盛。宋姑不论,以吴兴姚铉所集《唐文粹》观之,奚啻三百余姓,虽张、苏、萧、李、常、杨之流,气逸辞雄,各自名家,终不能返于古,何哉?无所宗也。独韩愈氏吐词持论,一本之六经,然后斯文焕然可观。故凡经其指授者,往往以文知名于一世。夫浑涵弥纶之道,淳庞冲雅之音,欲藉是以宣扬之,使其文字各从职而不紊,苟不传之于师,奚可哉?

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77)卷五《西林李先生诗集序》:夫自汉魏以降,言诗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时,李、杜擅其宗,其它则韦、柳之冲和,元、白之平易,温、李之新,郊、岛之苦,亦各能自名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制作矣。

辛文房《唐才子传》(徐明霞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卷二:尝读《选》中沈、谢诸公诗,有《题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修竹茂林》,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斋中读书》、《南楼中望所迟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数端,皆奇崛精当,冠绝古今,曾无发其蕴奥者。逮盛唐,沈、宋、独孤及李嘉祐、韦应物等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数题,片言不苟,皆不减其风度,此则无传之妙。逮元和以下,佳题尚罕,况于诗乎?立题乃诗家切要,贵在卓绝清新,言简而意足,句之所到,题必尽之,中无失节,外无余语,此可与智者商榷云。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四部备要本)卷三七《答章秀才论诗书》:至于大历之际,钱、郎远师沈、宋,而苗、崔、卢、耿、吉、李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黄初,诗道于是为最盛。韩、柳起于元和之间。韩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势若掀雷抉电,撑决于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谢之中,而措词俊逸清妍,应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于轻俗,王、张过于浮丽,要皆同师于古乐府。贾浪仙独变入僻,以矫艳于元、白。刘梦得步骤少陵,而气韵不足。杜牧之沉涵灵运而句意尚奇。孟东野阴祖沈、谢而流于蹇涩。卢仝则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诡。至于李长吉、温飞卿、李商隐、段成式,专夸靡曼。虽人人各有所师,而诗之变,又极矣。比之大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开元哉。

王祹《王忠文集》(四库本)卷五《练伯上诗序》:开元、大历杜子美出,乃上薄风雅,下掩汉魏,所谓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风骚而友建安,与杜相颉颃;复有王



摩诘、韦应物、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以及钱、郎、苗、崔诸家比比而作；既而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诗道之盛，于是为至，此又一变也。然自大历、元和以降，王建、张籍、贾浪仙、孟东野、李长吉、温飞卿、卢仝、刘叉、李商隐、段成式，虽各自成家，而或沦于怪，或迫于险，或窘于寒苦，或流于靡曼，视开元遂不逮；至其季年，朱庆余、项子迁、郑守愚、杜彦夫、吴子华辈，悉纤弱鄙陋而无足观矣，此又一变也。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四《古诗选唐序》：李唐有天下三百余年，其世盖屡变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诗，其体裁非不犹中唐之诗也。中唐之诗，其体裁非不犹盛唐之诗也。然盛唐之诗，其音岂中唐之诗可同日语哉？中唐之诗，其音岂晚唐之诗可同日语哉？昔襄城杨伯谦选唐诗为《唐音》，……自李唐一代之诗观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谦以盛唐、中唐、晚唐别之，其岂不以此乎。然而盛时之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之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也，其亦异乎大、小《雅》、十三《国风》之所以为正为变者矣。

方孝孺《逊志斋集》（四部丛刊本）卷一二《张彦辉文集序》：惟陶元亮以冲旷天然之质，发自肺腑，不为雕刻，其道意也达，其状物也核，稍为近古。韩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杰善辨说，故其文开阳阖阴，奇绝变化，震动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为一家言。其同时则有柳子厚、李元宾、李习之之流。子厚为人精致警敏，习之志大识远，元宾激烈善持论，故其文皆类之。五代之弊，甚于魏、隋之间。

程敏政《明文衡》（四部丛刊本）卷五六律诗：律诗始于唐，而其盛亦莫过于唐。考之唐初，作者盖鲜，中唐以后若李太白、韦应物犹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诘则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则近体盛而古作微矣。

高木秉《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总叙：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

刘埙《隐居通议》（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六《桂舟评论》：惜汉、魏降至陈、隋，亡国之音著，而诗之律已绝响，悲夫。经几百年而后风飘律吕，律中鬼神，始振响于浣花溪上。杜牧诸贤，又复振遗响于开元、天宝之后。元和以来，诗之律始大备于唐矣。尝谓五十六字，乃一篇有韵之文，分寸节度，有一字位置不安，即不纯熟，此又阴有合五音六律自然之妙也。

周叙《诗学梯航》（明成化本）“叙诗”：唐诗之体自分而为四，唐诗之格遂离而为十。何为四？初唐（景云以前）、盛唐（景云以后、天宝之末）、中唐（大历以下，元和之末）、晚唐（元和以后至唐季年）也。初唐之诗，去六朝未久，余风旧习犹或似之。盛唐之诗，当唐运之盛隆，气象雄浑。中唐之诗，历唐家文治日久，感习既深，发于言者，意思容缓。晚唐之诗，于唐祚衰歇之际，王风颓圯之时，诗人染其余气，

沦于委靡萧索矣。

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卷二六引《江雨轩诗序》:理之所在,倚形寓物,必有天机,遇感而动,则气血者尤焉。鸟之春音,蛩之秋韵,谁使之耶?匹夫匹妇羈臣贱妾之悲欣喜怒、劳逸惨舒,发于歌谣杂咏,皆有感于天机不能已者而泄其鸣。由于天理自然之公,平易和正,无穿凿诡怪偏曲之私,足以形是理之妙。先王采圣贤之格言,《雅》、《颂》并列,为感善惩恶之具。故诗之作,无不本诸此《诗》。然世降末流之异,昔人之论,虞、夏之下,晋、魏以上,气格未相远也。晋宋颜、谢至唐初,高下虽殊,古法未大变。律诗出后,至于大盛,参以全、贺、郊、岛、元、白之谲怪寒瘦鄙俚等风,兴沿流斗,靡动晚唐之论刺,何也?盖诸子才气豪放,穷思远索,务求人所未道以快其高,不知由其豪放穷思远索穿凿之私,遂与古法平易遐矣。

李梦阳《空同集》(四库本)卷六二《与徐氏论文书》: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庄波、简侈、浮乎之界分也。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机关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彼睹冠冕佩玉,有不缩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向使繁巧险靡之习,诚贵于情质宛洽,而庄波、简侈、浮乎,意义殊无大高下,汉、魏诸子不先为之邪。故曰争者,士之屑也。然予独怪夫昌黎之从数子也。

刘成德《唐司业张籍诗集序》(张籍《张司业集》,四部丛刊本):唐开元盛时,杜甫、李白、高适、储光羲、王维诸贤,至大历以后,已两变矣。当时以文名家者,有韩愈、柳宗元、李翱、张籍之徒,相与奋起振六朝五季漓澆之习,而自成一家之言。韩昌黎、柳柳州、李协律集俱盛传。……夫诗文至五季,坏亦极矣。而元和中昌黎公特振衰颓,以古文自任,其议论正大,气象雄伟,可以羽翼六经。而柳宗元得叙事之体,变化莫测,起伏层迭。昔人评其文曰:韩愈之文出于经,柳宗元之文出于史。故一时文人响应,而李翱、张籍出入门下,为昌黎厚友。籍性狷直率,博闻好古,议论胜人,其排佛老,尝言不能著书如孟轲、扬雄以垂世,观其昌黎代作李浙东一言,议论风生,期大之意甚深,谓其善为乐府,使人凭几而听之,未必不若丝竹管弦敲金击石也。其《送孟东野序》曰:“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高出魏晋。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鸣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之命则悬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韩愈之哀三子之才,至于如此。余并其诗而观之,其乐府诗景真情真,有风人之意。而五言近体,又皆劲健清雅,脱落尘想,俱从胸臆中出。然后知昌黎之诗丰而腴,柳州之诗峭而劲,司业之诗新而奇,李翱之诗悲而壮,卒皆可传。惟东野之诗则有穷促寒苦之状,吾恐温厚之教或不若是,观者自有巨目,不待余贅言也。今昌黎《原道》功业,为唐独出,血食庙庭;而柳州、李翱、张籍之文,为世所珍,是和其声而鸣其盛,非穷悲而自鸣矣。

谢榛《四溟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卷二:杜约夫问曰:“点景、写情孰难?”予曰:“诗中比兴固多,情、景各有难易。若江湖游宦羈旅,会晤舟中,其飞扬轳轳,老少悲欢,感时话旧,靡不慨然言情,近于议论,把握住则不失唐体,否则流



于宋调，此写情难于景也，中唐人渐有之。冬夜园亭具樽俎，延社中词流，时庭雪皓目，梅月向人，清景可爱，模写似易，如各赋一联，拟摩诘有声之画，其不雷同而超绝者，谅不多见，此点景难于情也，惟盛唐人得之。”

都穆《南濠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古人诗有唱和者，盖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体制兼袭其韵也。后乃有用人韵以答之者，观老杜严武诗可见，然亦不一一次其韵也。至元、白、皮、陆诸公，始尚次韵，争奇斗险，多至数百言，往来至数十首。而其流弊至于今极矣，非沛然有余之才，鲜不为其窘束。所谓性情者，果可得而见邪？

《徐文长三集》（《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卷一六《与李友》：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润。不知近日学王、孟人，何故伎俩如此狭小，在他面前说李、杜不得，何况此四家耶？殊可怪叹。菽粟虽常嗜，不信有却龙肝凤髓，都不理耶。

陆时雍《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异好详。求其所自，似得诸晋人《子夜》、汉人乐府居多。盛唐人寄趣，在有无之间，可言处常留不尽，又似合于风人之旨。乃知盛唐人之地位故优也。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之之敛也。初唐人承隋之余，前华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淡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于律，自有所由来矣。绝去形容，独标真素，此诗家最上一乘。本欲素而巧出之，此中唐人之所以病也。李端“园林带雪潜生草，桃李虽春未有花”，此语清标绝胜。李嘉祐“野棠自发空流水，江燕初归不见人”，风味最佳。“野棠”句带琢，“江燕”句则真相自然矣。罗隐“秋深雾露侵灯下，夜静鱼龙逼岸行”，此言当与沈佺期、王摩诘折证。专寻好意，不理声格，此中、晚唐绝句所以病也。诗不待意，即景自成；意不待寻，兴情即是。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内编卷二：今人律则称唐，古则称汉。然唐之律远不若汉之古。汉自《十九首》、苏、李外，余《郊庙》、《饶歌》乐府及诸杂诗，无非神境，即下者犹踞建安右席。唐律惟开元、天宝，元、白而后，寢入野狐道中。今人不屑为者，往往而是，亦时代使然哉。卷三：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秣纤修短，得衷合度，畅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余，步骤不足。昌黎而下，门户竞开，卢仝之拙朴，马异之庸猥，李贺之幽奇，刘叉之狂谲，虽浅深高下，材局悬殊，要皆曲径旁蹊，无取大雅。张籍、王建稍为真淡，体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绮绘，渐入诗余，古意尽矣。卷五：元和如刘禹锡，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诗迥别，故知气运使然。虽韩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诗至钱、刘，遂露中唐面目。钱才远不及刘，然其诗尚有盛唐遗响，刘即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矣。刘如“建牙吹角”一篇，即盛唐难之，然自是中唐诗。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